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 不断推动政德教育工作高质量发展

济宁干部政德教育学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专家论坛论文辑要

治国之道，任人唯贤

■王学斌

三国蜀汉政治家诸葛亮曾主张治国理政“务在举贤”，“为人择官者乱，为官择人者治”，如此方是正确选拔人才之法。可见选人用人自古便是传统吏治的关键内容。就吏治问题而言，我国历史有着极为丰富的素材，悉心梳理，古今对比，鉴其得，察其失，可为当前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提供一些颇值参考的经验与教训。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国以人兴，政以才治，无论国家治理，抑或地方治理，选人用人都是不可或缺、重中之重的工作，恰如东汉学者王符所形容的，“治世不得真贤，譬犹治病不得真药也”。

回首中国历代王朝鼎革变迁，人才往往是第一位的因素。汉高祖刘邦在总结西汉建立的成功经验时，认为关键所在便是得人：“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这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汉初三杰之综合素养，在当时众多俊杰中属于上上选，他们的功业造就了西汉开国的气象与规模。

无独有偶，唐代盛世局面的出现，也多与政府善于得人密切相关。唐太宗以亡隋为戒，用人唯贤，于是决策时有房谋杜断，纳谏时有魏徵、马周，用兵时有李靖、秦琼，集一时之贤能，迎来了贞观之治。唐玄宗延续太宗之风，在吏治方面严加整饬，善用良材，先后任命姚崇、宋璟、韩休、张九龄诸人为相，朝局趋于稳定，堪为古代治世的典范。

与此同时，值得后人深思的是，盛唐走向衰落，也与人才使用密切相关。玄宗执政后期，宠信李林甫、安禄山等佞相乱臣，危机暗中累积滋长，导致安史之乱爆发，政局混乱不堪，“洛阳宫殿烧焚尽，宗庙新除狐兔穴”，百姓流离失所，“当闻一缗直万钱，有田种谷兮无流血”。难怪杜甫哀叹“伤心不忍问耆旧，复恐初从乱离国”。人才关乎国运兴衰，关乎事业成败，“为政必多务实，唯用贤为国之大事。治乱必于斯，兴亡必于斯”，需要认真总结与研究。

用人之要，选贤任能。《管子·立政》专对国家治乱之原有过精到剖析：“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倘若大臣的德行与地位不相称，功劳与俸禄不相称，能力与官职不相称，让不具有能力的小人擅权上位，那么这个国家极可能陷入是非不明、政令不通、正道不行、祸乱不止的险境。这实际上提出了为政者该如何权衡官吏德行与才干关系的命题。

降至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在其《资治通鉴》开篇就借春秋末年晋国郤縠(时人尊称智伯)覆亡的教训，对德才关系进行了系统讨论。在司马光看来，“智伯亡也，才胜德也”。他才华出众，但德行有亏，走向绝路纯属咎由自取。司马光将人分为四种：德才兼备者堪称“圣人”，有德才弱者是“君子”，有才无德者之为“小人”，无德无才者只能归为“愚人”。众所周知，在古人心中，圣人不常有，但用人问题一直存在，所以一旦遭遇人事任免提拔，“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在今人看来，这种宁要无能之辈，不用有才之人的作法，恐怕不利于社会的发展、事业的进行。然而，司马光此主张的背后，有着更为深沉的忧虑与思考：“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干，是德行的辅助资本，德行，是才干的中心统帅。二者合则双美，分离却未必两伤。因为德行胜过才干之人，他至少是个君子，如果才干盖过德行，他便是“拔才以自强不息”的小人，其后果不堪设想。自古以来，乱臣贼子，大多“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苟瑶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吗？言及此处，司马光又补上一句，希望主政者在用人方面，“能审于才德之方而知所先后”，真正拿捏清楚德才二者的关系。可惜历来统治者往往难辨善恶，重用小人，政局最终无可收拾。是故司马光“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观点的提出，透露着他阅尽前史后的清醒与无奈。

由此可见，选用干部，“要严把德才标准”。倘若干部缺乏必要的政治品德和个人私德，势必会对国家产生负面影响。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把在2018年参加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要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党员干部“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深意所在。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政治过硬，方堪重任。这也是我们党一直以来组织工作的选人用人标准。

选拔人才只是优良用人工作的一个环节，对于符合德才标准的干部，组织一要用人不疑，增强他们对组织的信任与认同。唐代诗人白居易认为唐太宗能够延揽天下英才，秘诀即“速在推心置人腹。”二要善于培养，对于缺乏实践经历的小人，创造机会让他们“到重大斗争中去经受锻炼，在克敌攻坚中增长胆识和才干”，对于在实际工作中倍感本领恐慌、能力不足的干部，“要加快干部知识更新、能力培训、实践锻炼，要把那些能力突出、业绩突出，有专业能力、专业素养、专业精神的优秀干部及时用起来”。最终形成物色人才、培植人才、储备人才、考察人才的良性循环与相互反哺。

任人之要，各得其所。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荀子·大略》中关于人才类型与处理的思路，颇值得我们参考。该篇认为国之人

才，“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言行一致、德才兼备者，一国之内并不多见，这是担负重任的宝贝；言词木讷、做事正直者，属于国家各项事业的骨干，这是值得信赖的重器；讲求德行、拙于实践者，也能为国家发展贡献一份绵力，这是可供使用的力量。而那种当面说得天花乱坠、背后做事龌龊不堪的“两面人”，须时时警惕，这是影响国家大计的妖孽。正基于此，主政者应“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

既然干部能力有大有小，专长各有不同，所以在具体使用时应“坚持事业为上、依事择人、人岗相适”。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不胜枚举。如战国时魏武侯任命孟尝君田文做国相。这一人事安排，令同在魏国为官的臣田吴起很不服气。一日吴起跑来与田文当面对质，问道：“我想与你比一比能力和功劳，可以吗？”田文爽快回答：“可以。”于是吴问：“统率三军，让士兵乐意为国效命，令敌国不敢图谋魏国，这方面你和我比，谁更强？”田文坦言：“我不如你。”吴起接着问：“管理文武百官，处理诸多公务，让百姓亲附，让府库充足，这方面你和我比，谁更在行？”田文继续坦言：“我不如你。”吴起不依不饶又问：“我曾经拒守西河令秦国军队不敢东犯，令韩国、赵国慑于军威归顺服从，你和我比，谁功劳更大？”田文还是回答：“我不如你。”三轮问答作罢，表面上看，论武功、论文治、论功绩，田文都输给吴起，二者差距似乎很大。吴起越想越气，责问道：“既然这三方面你都不如我，可是你却出任国相，职位在我之上，岂有此理！”

田文并未被吴起的气势吓倒，他极其淡定地说出了其中的缘由：“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时，属之于子乎？属之于我乎？”旧君王刚刚去世，新君主年纪尚轻，大臣不亲附，百姓不信任，处于这么一个权力交接、局势微妙的过渡期，你说国之政事交给给谁更合适？听完此话，吴起沉默了许久，开口承认：“确实应该托付给你啊。”

吴起之所以自愧不如，就在于虽然论文韬武略，田文稍逊一筹，但是他所展现的胸襟与涵养，正是一名大政治家所独有的格局与素质。看似不显山露水，实则厚重沉稳，危机四伏、形势莫测之际，恰恰需要田文这样的人方能掌控大局，慑服众人。两相比较，吴起才能堪称翘楚，但沉稳不足、德行不够，田文表面不高明，暗藏大智慧，一是“国器”，一是“国宝”，角色不同，功能各异，身处位置恰如其分。魏武侯知人善任，用人之长，避人之短，值得我們思考。

人才能力各异，况且受各种因素限制，往往被发现时间不免有先有后，因此选拔人才常需打开视野、不拘一格，广开进贤之路。战国时齐主主张“贤能不待次而举”，任用贤能不能完全论资排辈。西汉董仲舒上书汉武帝，批评当时官场“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乱，贤不肖浑淆”，可见完全依凭资历升迁，政坛没了动力，官德每况愈下。唐太宗认为“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襄盖王神通是也；如其有才，虽仇不弃，魏征等是也。今日所举，非亲私也”。提拔任命官员，应不讲关系亲疏，勿论私人恩怨，视其能力水平高低来予以相应的职务。到了晚清，思想家龚自珍更是发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吁，希望主政者能破除一切用人思路上的痼弊陈规，保证人才各得其所，施展所长。不难发现，苟子、汉武帝、唐太宗、龚自珍所身处的时代，都是社会剧烈转型的大变革阶段，因此他们对于人才的渴望尤为急切，更需要破除陈规使用人才。东晋学者葛洪在总结汉代用人经验时，曾讲过这么一番话，“锐锋不可以钝石，明火炽乎暗木，贵珠出乎贱蚌，美玉出乎丑璞。是以不可以父母限重宝，不可以祖祢量玉、霍也。”锐利的刀锋取材于山中重石，炽热的烈焰借助于钻木取火，名贵的珍珠包裹在不名一钱的蚌壳中，精美的玉石深藏在粗糙坚硬的璞石里，是故不因父母的德行地位而限制儿孙的前程，也不因父青、霍去病的低下身份而无视他们的才干。西汉名将卫青、霍去病都是私生子，出身问题自小为人家奴，供人驱使。不过时值征伐匈奴的用兵之际，汉武帝慧眼识英才，于众人之中超擢卫、霍二人，委以重任抗击匈奴，从而立下不世之勋。这种做法，既实现了人尽其才，又产生了正向激励效应，用好一个人能激励一大片，有其独到之处。

“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蕴含着丰富的史治实践与思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这些思想和做法“也带有明显的历史局限，其中有不少封建糟粕，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因此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做好干部培育、选拔、管理、使用工作，要坚决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依据当今世情国情党情，对于古代吏治问题要进行批判性继承、创造性转化，我们应注重提炼古代吏治思想的有益经验，善于发掘传统制度精神的合理内核，辩证对待，为我所用，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把党内外、国内外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的伟大奋斗中来。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中国史教研室主任、教授，济宁干部政德教育学院尼山学者)

自强不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内在精神动力

■宋立林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天下为公”等十个词汇，来概括中国人民在漫长历史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这些观念源自先民的社会实践所提炼出的智慧，记载在中国原典之中，通过经学、教化得以代代传承，正是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根源，也是今天我们增强文化自信的底气所在。在十个词汇中，“自强不息”是人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它所展现的恰恰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一种基本精神，也是我们能够应对各种挑战、危机而生生不息的内在精神动力。1914年冬，著名学者梁任公先生应邀为清华学校学生讲演，题目为《君子》，他以乾坤两卦的大象作为契入点，阐释君子精神。《乾》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象云：“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他就“自强不息”阐释说：“乾象言，君子自助犹天之运行不息，不得有一暴十寒之弊。才智如董子，犹云勉强学问，《中庸》亦曰，或勉强而行之。人非上圣，其求学之道，非勉强不得入于自然。且学者立志，尤须坚忍坚毅，虽遇颠沛流离，不屈不挠，若或见利而进，知难而退，非大有为者之事，何足取焉？人之生生，犹舟之航于海。顺风逆风，因时而异，如必风顺而后扬帆，登岸无日矣。”此后清华大学便将此八字作为校训。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更是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视为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良有以也。

古代中国秉持“一个世界”的宇宙观，因此看待天地自然往往有一种“德性自然观”和“观象比德”思维。而《周易》则集中体现了这样的文化特征。四库馆臣说：“《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这种“推天道以明人事”就是“观象比德”的一种目的。这种思维在孔子那里得到了继承和自觉。《礼运》所谓“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一语正反映了孔子的思想。《论语》中“唯天为大，唯尧则之”也是同样的意思。人道，尤其是以礼为核心的为政之道，都是效法天道而来，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自强不息”正是先哲通过对天道的观察、体悟而用来确立人道的。这一点我们在《孔子家语·大婚解》中得到印证。鲁哀公向孔子提出一个问题：“君子何贵乎天道也？”孔子的回答是：“贵其不已也。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而能久，是天道也；无时而勿息，是天道也；已成而明之，是天道也。”这段话，其实完全已经对“自强不息”的天道意蕴进行了深入的揭示。基于此，孔子在谈到君子的品质时，就有了“自强不息”这一条。据《孔子家语·五仪解》：孔子认为：“所谓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义在身而色无伐，思虑通明而辞不

■张梧

蕴含天人合一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天人合一理念，蕴含着中华民族对整个宇宙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和看法，即天道与人道的内在统一，自然与人事的相互贯通，一切人类活动均应顺乎自然规律，力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中华民族以“万物一体、中和位育”的整全视野看待自然，以“道法自然、顺天应时”的平和心态尊重自然，以“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生态智慧利用自然。进入新时代，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离不开对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理念的充分汲取与现代转化。

天人合一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中华文化源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和共同建设美丽地球家园的大局出发，创造性提出一系列的生态文明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系统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中华文化与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天人合一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华文明的天人合一理念主张“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人与自然万物具有共同的本源，遵循共同的法则，并且构成相互联系的系统整体。习近平总书记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整体观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重大论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阐明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自然是生命之母，大自然是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物摇篮，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等等，在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天人合一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结合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理念与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具有高度契合性。马克思把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高度统一视为共产主义的鲜明特征，“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恩格斯则在《自然辩证法》中强调，“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的，我们同他们的肉、血和头脑一起都是属于自然界的，存在于自然界中”。人类活动一旦违背自然界的内在规律，必将遭到自然界的报复。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观点与中华文明的天人合一理念相互融通。中华文明始终坚持“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共生理念，追求“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的和谐境界，强调敬天保民、重农顺时等朴素的生态观念。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指导地位，诞生于农业文明时代的天人合一理念才能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焕生机；只有立足中华文明的天人合一理念，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

“厚德载物”理念的丰富内涵和当代价值

■李秀亮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所蕴含的诸多核心理念，“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在这些诸多传统化理念中，“厚德载物”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张岱年语)，其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值得深入挖掘和系统阐发。

一、“厚德载物”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华民族精神“厚德载物”作为一个词汇虽然最早出现于《周易》，但“德”的观念却早在数千年之前的文明初始阶段便已经产生了。从字源上推测，“德”字当来源于远古先民对日月天体活动规律的认知和总结，是人类认知自然、探索宇宙的集中体现。在甲骨文中，“德”字写作等形，从心从直，非指行走、道路，而是太阳的拟人化，整个字作太阳在行走、运行之状。远古时期，先民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非常低下，故普遍认为自然界的日月星辰、山川河流等都是有生命、有灵性的。其中，太阳的东升西落、循环往复，既带来了光明和温暖，又孕育了人类生存所需的万事万物。而大地的深厚宽广与博大富饶，则为人类生活提供了物质屏障和场所空间。就这样，德字在被创造之初，便具备了太阳、大地等天体神灵仁爱无私、承载万物、敦厚宽广的品性和特质。

后来，德字在反复使用过程中，又被赋予了规范、美善、光明、正直、仁爱等多种内涵。如“感恩曰德”，“德谓善教”，“化育万物谓之德”，“中庸之为德”，“孝敬忠信为吉德”，“德者，善美、正大、光明、纯懿之称也”。《尚书·洪范》将“正直、刚克、柔克”称为“三德”，《周礼·地官》将“刚、仁、圣、义、中、和”誉为“六德”，《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则将“度、莫、明、类、长、君、顺、比、文”等合称为“九德”，并坚信只有“九德不愆”，才能“作事无殃”。从中可知，“德”的内涵非常丰富，包罗万象，其内容至少可总结为这样六个方面：温润敦敏的高尚品德、容纳天下的宽阔胸襟、承载万物的济世情怀、不息不殆的奋斗精神、治国安邦的行为准则和天地合一的发展理念等。这些多样内涵，便使“厚德载物”理念逐渐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而深深影响了世代中华子民。著名思想家张岱年先生曾将“厚德载物”和“自强不息”共同界定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民族精神”，“在铸造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著名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曾于1941年以《君子》为题，对“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精神作了专题阐发。受其影响，清华大学便直接将它们定为校训，并一直沿用至今。

二、厚德载物、重德敬德、以德为先是中华文化的一贯精神

《周易·坤卦》载：“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思是说，君子应该像大地一样，德行敦厚，胸怀宽广，并进而包容诸象，承载万物。与“自强不息”重在强调君子的积极进取精神不同，“厚德载物”主要体现了君子博大宽容和温敏敦厚的尚高品质。这种以德为先、重德敬德的理念，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长期居于核心地位。历代中华先民在生产生活中的各个场合，都时刻表现出对德的尊崇和信奉。

为人以德、方能安身立命。“何谓六德？圣智也，仁义也，忠信也”(郭店楚简《六德》)。这说明圣、智、仁、义、忠、信等都属于德的范畴，而它们也是个人安身立命的基本准则，所谓“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周易·系辞上》)。儒家在完善自身德行过程中，始终将仁视为个人道德的最高准则，并坚信“仁者爱人”。一个人只有笃行仁道，对朋友有信，对君上有义，亲亲、仁仁、敬德、好义，然后在此基础上推己及人，泛爱他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才能真正实现个人价值。

为政以德，方能固国邦宁。早在禹执政之时，便要求各

理论就能在中华大地根深叶茂。

天人合一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底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西方现代化曾经走过“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化时至今日仍然是建立在“人口少、能耗高”的基础之上。有鉴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走美欧老路是走不通的，再有几个地球也不够中国人消耗”，“走老路，去消耗资源，去污染环境，难以继！”作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在资源环境约束日益收紧的条件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就必须继承发展道家自然、天人合一的中华文明生态智慧。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坚决摒弃贪取自然、破坏自然的传统模式，就是因为中华文明蕴含着敬畏自然、人与天调的生态智慧。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我们应当自觉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按照“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的重大理念，结合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坚信，传承千年、生生不息的天人合一传统，必将为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和文化滋养。

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的中国智慧。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生态问题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当今世界正在面临着严峻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全球气候变暖等环境问题迫在眉睫，能源危机等生态资源制约日益加剧。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其中就有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弘扬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有助于为解决全球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弘扬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有助于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牢牢占据可持续发展的道义高地，彰显中国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的地位和作用。弘扬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有助于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凝聚起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合力。弘扬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有助于推动全球各大文明在生态问题上的交流互鉴、凝聚共识，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生态文明日益成为超越意识形态、打破文明隔阂、跨越国家边境的全人类共同关切问题和最大交流平台。越是在西方各国高筑“绿色壁垒”之时，越是要发挥中国引领绿色发展的全球领导力。传承弘扬中华文明的天人合一理念，责无旁贷，正当其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只有保持天人合一的文化底色，才能让祖国的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只有汲取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才能让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治理行稳致远。只有赓续天人合一的先人智慧，才能实现永续发展，造福子孙后代。只有光大天人合一的中国精神，才能让建设美丽中国与保护地球家园并行不悖。古老的天人合一理念，依旧闪烁着熠熠生辉的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济宁干部政德教育学院尼山学者)

级官吏必须具备“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有义”等九种基本品德。这说明古人很早便已认识到，治民者只有行事恭谨，处事柔和，待民和善、公平正议，严于律己，平易近人，坚持原则，善于协调，能力突出，心地良善，才能实现国家大治。孔子曾指出，各级执政者只有以德理政，百姓才会像众星拱辰卫北极星一样主动团结在你身边，并听从你的号令，安于你的治理(《论语·为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一治政理念，后来便成为历代儒家知识分子的 basic 执政原则。

国家重德，方能世代昌盛。德还有“治国安民”“经世致用”的功能，所谓“国之所以为者，德也”(《春秋繁露·保权位》)；“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尚书·武成》)。一个国家，只有广施德行，以仁政安民，百姓乐治，政治清平，才能长治久安。《管子·君臣上》称：“主身者，正德之本也”；《论语·颜渊》载：“主忠信，徙义，崇德也。”只要最高统治者广施德政，以德为先，爱民如子；各级官吏尚礼重德，以礼施政；普通民众安于德教，谦和中正，国家便能兴旺发达，长盛不衰。

可以说，“厚德载物”理念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小到个人修身立命，大到国家治境安邦，都能随处见到其身影。德的理念、崇德敬德的思想，已日益积淀为中华民族的深层文化基因。

三、“厚德载物”理念的当代价值随着中华文明五千年连续不断的发展，中华文化也一贯延续地连綿发展到今天。这其中，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所积淀的众多精神内涵和价值理念，也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不断转化创新，直到今天仍然有极强的理论指导意义。这其中，便包括“厚德载物”理念。

为政以德、德刑相辅的思想，为当今以德治国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丰厚的理论支撑。当今社会，伴随着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追求功利、强化收益、讲究感官享受、无视规则、道德滑坡等现象日益严重，精神文明和道德建设工作任务重道远。对此，我党适时提出了以德治国、并将其与以法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的治国方略，高度重视道德建设和精神培育，大力完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以德治国的方略，正是对传统文化中重德传统和尚德理念的接续发展和转化创新。

以德抚民、和合万邦的思想，为当今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充足的动力支持。在汉唐时期，执政者本着开放包容的心态，对异域文化广泛吸收，积极引入，从名马美酒到声乐歌舞，从科技创新到思想文化，无不以强大的魄力和开放的气度兼而收之，并借此改造和完善本民族文化，从而迎来了中华文化发展的高峰。目前，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大业中，这些“厚德载物”和合万邦的理念依然具有强大的借鉴意义和理论价值。敬天重德、天人合一的思想，为当今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在中华传统文化中，自然不是需要人类征服的对象，而是人类赖以生存、需要以德抚之的重要载体。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应遵循循先王之德教，与天地合其德，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充分遵循自然规律；并注重节约资源，取物以时，弛张有度，与自然和谐共处。从而有效维护生态系统，乐天保天下，彼此和谐相处。这种爱物、惜物和德化万物的思想，与当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是完全相通的，故可以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的理论借鉴。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包括“厚德载物”在内的诸多传统文化精神，“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我们应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下，深入挖掘其丰富内涵，加快其转化创新步伐，从而更好地资古鉴今，古为今用。

(作者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副教授)